

主编 赵靖

#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主编 赵靖  
副主编 石世奇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赵靖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

ISBN 7-301-07287-2

I. 中… II. 赵… III. 经济思想史—中国—1840~1925  
IV. F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1320 号

**书 名:**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

**著作责任者:** 赵 靖 主编

**责任编辑:** 梁鸿飞 王煜玲

**装帧设计:** 林胜利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287-2/F·0843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9.75 印张 488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80 元(精)

38.80 元(平)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序言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是《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的续编。它所研究的是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 1925 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前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同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时期相比是十分短暂的,但它在性质、内容、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同外来经济思想的关系等方面,都同传统经济思想有根本性的区别。因此,我们不把它作为《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的一个普通的组成部分,<sup>[1]</sup>而是把它编为《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论述课题,与前书并立。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求。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就由封建社会一步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几亿中国人民陷入了极端贫困、落后、屈辱、受压迫的深渊,国家面临着被瓜分、被灭亡的危险。中国人民为挣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而展开了前仆后继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 1949 年推翻了外来殖民统治和国内的封建统治,建立了由中国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中国人民遭受外来侵略势力压迫的历史,但这种民族压迫同历史上中国国内不同

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征服不同,它不是单纯由军事力量强弱差别形成的,而是以经济制度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为基础的。西方列强所以能以武力战胜中国,在政治上压迫、奴役中国,归根到底是由于它们有比中国远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而有比中国强大得多的综合经济实力。因此,中国要想彻底摆脱外来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奴役,单靠进行军事斗争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是不得要领的,关键是必须找到在经济上摆脱落后,跻身于先进民族的道路,也就是找到发展中国的道路。

怎样发展中国,使中国能在经济实力方面赶上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正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历尽千辛万苦,不惜奋斗牺牲一直在寻求解答的问题。人们从不同条件和角度为解答这一问题所提出的各种主张、方案以及为此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和论证,构成了鸦片战争失败后百余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由于这一问题在中国近代还未能完全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为解决此问题而进行实践的 and 理论的探索。中国的发展问题也将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思想研究的主要课题。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发展思想,可是,中国人士使用“发展”或“经济发展”之类的词汇,却是比较晚的事情。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仍是在“富强”或“富国”、“富民”之类的口号下表达发展中国,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状况的要求。

富强和富国、富民之类的提法,不是中国近代才有的,在鸦片战争前两三千年,谈论经济问题的人就一直把富强和富国、富民作为追求的目标,怎样实现富强和富国、富民,早已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中心内容。

到了中国近代,国家积贫积弱,挣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暗夜中的悲惨处境,更使广大中国人民对富强和富国、富民,抱着日益强烈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思想领域关于富强和

富国、富民问题的探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人们所关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单从形式上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关于富强和富国、富民的重视,好像不过是传统经济思想的沿袭和强化,其实不然。中国近代所探讨的富强和富国、富民,同传统经济思想所谈论的有关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富强和富国、富民,在传统经济思想和近代经济思想中,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思想,其根本区别在于:

第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谈论的富强和富国、富民,不包括经济发展的内容,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所探讨的富强和富国、富民等问题,却恰恰是以经济发展为根本前提和特征性内容的。

中国古代所说的富强和富国、富民是建立在农业、手工业小生产基础上的经济要求,其内容是维持农业、手工业简单再生产的正常运行,至多只能在量的方面使生产有所增长,例如开垦较多土地或增加劳动力数量所带来的某些增长,而不可能有投资增加和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扩大再生产,不可能有生产方法和投入产出方法的革命带来的生产的巨大增长。

中国近代所探讨的富强和富国、富民等问题,其性质和含义则大不相同。人们日益认识到,中国所以贫穷、衰弱,就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方式远比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落后,中国要想富强,要想改变贫穷、衰弱和受侵略、受欺凌的局面,如果保持原来的落后生产方式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求富强的出路,只能是用西法“导民生财”<sup>[2]</sup>,即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中国传统的落后生产方式,实行生产方法和投入产出方法的根本革命,变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小生产为社会化的大生产。由此可见,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所谈论的富强和富国、富民,虽然在用词上与传统经济思想相同,实质上却是根本不同的。中国近代所谈论的富强和富国、富民是必然同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在中国近代,没有经济发展,就根本谈不上富强和富国、富民。

第二,传统的经济思想所说的富强和富国、富民,都完全是

立足本国内部的条件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中国近代则必须在对外开放的局面下，借鉴外国的经验，借助外国的某些条件（资金、技术、人才等）来求得问题的解决。

中国在古代漫长历史时期中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国家，同外部世界没有经常的、不可或缺的经济联系。虽然同外国也有某些交往（包括某些经济交往）和贸易，但这些交往和贸易规模不大，不经常，对中国的经济生活没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而且，中国古代的经济水平又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特别是高于周围国家。因此，中国古代考虑富强和富国、富民等问题，基本上都是从国内设法进行某些调整或改革，如移民垦荒、兴修水利、轻徭薄赋、抑制兼并之类，而不包括从外国寻求借鉴和帮助的问题。

中国近代的情况则与此大相径庭。资本主义是一种不断对外扩张的制度，资本主义列强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到处寻求市场、原材料来源和殖民地，这就使落后的国家要么陷入被掠夺、被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要么力求发展自己，实现富强。所谓资本主义迫使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sup>[3]</sup>，正是指的这种情况。经济发展问题对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命运攸关的问题。

但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想在对外封闭的状况下单纯依靠自身内部的条件寻求发展的道路、经验和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惟一的办法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借鉴和利用外国的经验和方法，利用外国的经济、技术条件来发展自己。

第三，传统经济思想所谈到的富强和富国、富民，都是要在封建专制的政治框架下进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所要求的富强和富国、富民，都和封建专制的政治框架根本不能相容。

在中国古代，至少是在秦统一六国，建立一统的封建王朝之后，人们关于富强和富国、富民之类的探讨，都是在封建专制政

权的统治下进行的,因而,其设计和实施,都不以政治制度方面的根本变革为前提。古代要求富国强兵的人,往往也要求在政治上实行一定的改革,例如王安石主张变法以求富强,也主张设立一批筹划和实施新政的机构,引进一批支持变法的官员,驱逐一批反对变法的人物。但是,这类政治改革,总是在政权的根本性质无所改变的情况下对机构和人事进行某些调整。王安石变法,尽管也为这类改革、调整而争斗不休,但宋政权之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权这一根本特点,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

近代的富强和富国、富民,却不可能在旧的政治制度框架内通过某些局部的调整、改革来实现,而必须以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为前提。由于近代的富国强兵必须在根本改革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它必然不为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封建买办性政权及其支持者外国殖民势力所容许。在近代中国,任何幻想不推翻外来殖民统治和本国封建统治而能求得中国富强的方案,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科技救国之类,都一一失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发展的途径和发展的政治前提。前者是怎样使中国由受封建主义束缚的、以农业为基础的落后的小生产转变为大机器和新式技术武装的社会化大生产,实现中国生产方式和投入产出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后者则是通过革命或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消除障碍,扫清道路。

这两者是中国近代发展问题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中国的经济落后是中国衰弱、屈辱,面临被瓜分、被灭亡危险局面的根源,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找到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使中国能够以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速度发展,使中国能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否则要想使中国独立自主,救亡图存,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近代中国人士产生发展中国的要求时,中国已落后于西方国家数百年,封建势力奴役下的农业小生产在经济生活中占着绝对优势地位,资本主义以前的陈旧事物充塞全国,又加上国土广袤,人口众多,各地区情况很不平衡,交通阻塞,联络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到一条迅速发展之路,迎头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确是极其困难的问题。

中国的发展途径问题本身已是世界各国发展史上所罕见的艰难复杂问题,而历史又不给中国以从容探寻发展途径的环境和条件。在中国开始认识到自身发展的必要性时,中国已日益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建立起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列强,为了维持和加强其在中国的殖民掠夺、奴役的利益,不愿意中国得到发展。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维护其地租、高利贷剥削利益,也不愿中国得到发展。这两种势力勾结起来,以各种手段野蛮、残酷地阻挠中国的发展,压制、摧残中国要求发展、要求改革的努力。外国殖民侵略势力是利用以先进的、强大的经济为基础的强大政治、军事力量,中国的封建势力是掌握政权的,有着几千年统治历史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这两种压制、阻挠中国发展的力量联合起来,势力极其强大。如果不克服这两种势力的联合压迫和阻挠,中国的发展就会举步维艰,并随时有陷于窒息、夭折的危险。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需要一定的政治前提,所需的政治前提如不具备,则发展的方案、计划、措施,都难得到顺利推行。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过这一问题,一些原来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发展,也曾为解决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而进行过严酷的政治斗争。但是,中国为解决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所遇到的困难之多,所经历过程之曲折漫长,所蒙受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中国人士对中国发展的这两个方面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大体说来,最初人们主要是从发展途径方面考虑问题,而

且,在发展途径方面的认识,也是由浅而深,逐渐前进,例如由强调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到强调“振兴商务”,进而又发展到“工体商用”,更进而提出了“振兴实业”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要求;由学习西方的机器、技术,进而要求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进到提出“全变”和“尽变西法”的主张等等。在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上,最初只是提出若干的具体主张,到后来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随着对封建政权腐朽、专制的认识的加深而发展到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要求,更进而发展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最后又在资产阶级革命屡遭失败和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的局面下前进到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

中国近代为解决发展途径问题和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所经历的长期艰苦的斗争历程,反映在人们的认识中,就形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跌宕起伏,千态万状的内容。

发展的途径问题和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都是中国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不解决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没有立足点和必要保证。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数年所断言的:

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sup>[4]</sup>

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sup>[5]</sup>

但是,取得了发展的政治前提,并不等于实现了发展,也不等于说发展的问题就轻而易举了。在已取得的发展的政治前提保证下,努力寻求适合中国的发展途径,并且坚忍不拔地努力加以实现,事实上比取得发展的政治前提的斗争是更复杂、更艰苦和更长期的工作。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的经济

思想,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赖以生存的历史条件有很大的差别。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条件长期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经济思想。这种经济思想是在春秋、战国直至西汉中期以前形成起来的。自此,中国的社会就一直处于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统治的农业自然经济状态下。传统经济思想是这种历史条件的产物,因而它表现为变化缓慢的特征,在漫长时期中变化微小,只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变化。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则不同。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紧闭着的门户,封建时代长期占支配地位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为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造成了某些条件,中国的社会逐渐由封建社会转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由于外国殖民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压制和阻挠,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极度困难和缓慢,但中国社会已不是一个长期停滞的、超稳态的封建社会,发展经济,根本改变社会经济面貌和国家面貌的要求,已在人们中间产生并逐渐增长起来。这种要求和呼声不断地出现在经济思想领域,就使中国的近代经济思想作为一种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本质不同的新的经济思想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人们所谈论的经济问题以及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式,都与历史上长期习惯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所固有的经济思想,是在未受外来重要影响的情况下土生土长的经济思想,这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一书中已作过充分的阐述和论证。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则是在外来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军事、政治、文化的发展情况也同西方相形见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学习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努力发展自己,以求自立于先进民族之林,才能摆脱被侵略、被奴役的局面。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正是

为此而出谋划策,探寻出路的。因此,中国近代的经济思想就不可能是闭门不问域外事,完全从国内条件考虑问题的经济思想,而必然是不断了解外国,不断借鉴外国的经济思想。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习和借鉴外国,自然也包括学习和吸收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在内,但还不止于此。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所以要学习西方是为发展中国寻求借鉴,因而,凡能够对发展中国提供帮助和借鉴的外国的方法、制度、资料、知识、理论,都能够成为学习和吸收的对象,都能够同发展中国的需要相结合而形成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部分内容,而限于系统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事实上,由于中国近代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且中国在长期封闭的局面被打破后,接触和认识西方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因此,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在学习西方和接受西方影响时,直接接受西方经济学,从中寻求帮助和借鉴的情况,是出现得较晚的,从西方的其他学术思想寻求解决中国的理论武器,也是较晚的。中国很长时期是从较具体的知识、制度、方法、资料等了解西方,并据以提出改革中国、发展中国的主张、方案和理论观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所以在许多方面缺乏深度,带有直观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是和这种情况有关的。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主要是在西方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向西方寻找真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已完全抛弃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几千年所形成的传统,不再从传统中保留和继承什么东西。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不仅包含着对西方事物和西方思想的不断学习和吸收,也包括着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合理的,仍然有生命力的事物的有选择的继承和发扬。

任何一种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sup>[6]</sup>。一个时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水平,表现形式及其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程度,都同

它由以出发的思想材料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作为一种同传统经济思想性质和内容都大为不同的新经济思想,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对传统经济思想逐渐扬弃的过程。但扬弃不是完全割断或者抛弃,而是一个鉴别、批判、选择和发扬的过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出生和成长于中国社会,不同程度地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影响,他们提出自己的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主张或方案,面对的是在中国社会中生长蕃息的中国人,他们自然而然地要从自身熟悉并为自己所要影响的对象易于理解的文化遗产中吸取有用的材料。前面谈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发展思想,它并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固有的,但中国近代的思想代表人物却从一开始就用中国传统思想所习用的富强和富国、富民来表达发展经济的要求。这样,同现代的社会化生产力相联系的经济发展要求,就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要求富国、富民的优秀传统接上了轨。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其他一些优良的传统,如批判的传统,要求改革的传统和富于理想的传统等,也被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所继承,并按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的要求赋予新的内容,如以“变法”来表达改革的要求,以“大同”来表达发展中国的远期理想和远期目标,以及通过对“重本抑末”、“贵义贱利”、“黜奢崇俭”等封建经济思想教条的批判来揭露封建经济思想在新时代对中国经济进步的压制和阻碍等。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许多代表人物对传统经济思想中 useful 材料的研究和利用是相当努力的。像孙中山这样一个主要是接受西方式教育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在为自己的革命纲领和经济学说准备理论基础时,既不辞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也不遗余力地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材料。据充分了解当时情况的冯自由记述: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孙中山在日本为创立民生主义学说(他的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不

仅苦心孤诣地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各种有关经济思想资料，还同当时在日本的许多中国著名人士如梁启超、章太炎等，反复讨论和酝酿：“如古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sup>[7]</sup>

但是，中国近代要寻求和吸收的经济思想资料，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是为寻求适合中国的发展途径和解决发展中国的政治前提而锻造理论武器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不包括发展的内容，中国古代有叛逆色彩或异端色彩的思想，也不包含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内容。因此，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是不可能找到很多对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直接有用的思想材料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主要不是从中国古代，而是从西方的经济发达国家寻找思想材料和理论武器的。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活动的进展，随着中国人士对发展途径和发展的政治前提这两方面认识的加深，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中国近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较为丰富的时期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先秦和近代，这不是偶然的。就近代而言，时间最接近，研究的现实意义也较大，保存下来的资料较多，较完备，对造成这种情况都有关系，但近代的经济思想本身较丰富，又较有特色，无疑也是重要的原因。

不过，总的说来，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仍未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经济学，中国在经济学领域还大大落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水平。这种状况是不足为奇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化生产力及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力水平之上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水平很低，在社会生产中不占重要地位；中国古代思想中缺乏认识和解决近、现代经济问题的思想资料；中国人士同西方接触时间不长，又是在激烈的碰撞、冲突中接触和交往的，因而

对西方的材料和经验,难以有比较充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中国近代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很多,也很复杂、繁难,但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进行思想理论方面的准备。

中国近代的经济思想和以前的一个很长时期相比,是比较活跃的和丰富多彩的,同时又是不成熟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sup>[8]</sup>中国近代的经济思想是当时的特殊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在经济思想发展的较早阶段,人们对经济问题的探讨,一般都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即“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sup>[9]</sup>,而不能从简单的,抽象的范畴,如商品、价值、货币、利润、利息、国民收入等着手分析。中国近代的经济思想既然还处于一种未发展成一门独立科学的阶段,情况也只能是这样。

1949年以前,有的治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早期学者就把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分为“纯理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认为“纯理经济学”在中国“至今还未见有自创的出现,一般经济学著作,大多系编译或转述的性质,无足深论”,而论述“现实经济情况”的“改进与创造”的“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改造思想”,则“远较为重要”,因为,重视这种经济思想,对于“国计民生的解决可得到直接的帮助”。<sup>[10]</sup>

这种分析对于弄清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在表现形式方面的特点,是颇有见地的。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大体可分为两个相继的阶段。

前一阶段大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至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1840—1924年)。分析和研究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和主要观点,正是本书的基本任务。

这一阶段是中国人士企图按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发展中国的时期。在这一阶段的大多数时间中,人们致力寻求的是发展中国的途径问题:从船坚炮利到振兴商务,振兴实业,直到张謇的棉铁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实业计划,都属于对中国发展途径的探寻。

在这种探寻中,中国人士感到中国的发展之路阻力重重,为寻求发展途径屡遭打击和挫败,认识到经济的发展没有国家的一定保护和支 持是不行的。但是,人们在很长时期是希望清政权采取某些具体措施对民间发展经济的努力给予支持和保护,这些具体措施包括设立保护商人权利的“商部”,成立有若干商人代表参加的“议会”(实际上是咨议会)以及与列强谈判修约等等,而没有提出改变清政权性质的政治改革要求。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的先进人士逐渐认识到:在列强殖民统治和清朝封建统治下,只通过一定的经济改革来使中国获得发展是不可能的,必须进行改革封建统治的政治改革,才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于是,要求实行根本政治改革的“全变”和“尽变西法”的口号以及实行这种政治改革的自上而下的变革方式——变法维新运动就发动起来了;与此同时,更激进的变革方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在海外及东南沿海的某些地区破土而出了。

变法维新运动的被镇压和八国联军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民族危亡的严重局面促使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进入高潮。中国的革命者在倾全力进行反清革命的同时已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所从事的革命运动对中国发展的意义,认识到中国的根本出路必须“开发生产力”,而中国人民开发生产力的努力为清朝统治“所制,欲开发而不能”<sup>[11]</sup>。这已是对于中国发展的途径和中国发展的政治前提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的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认识了。



但是,在近代中国,怎样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根本政治前提问题呢?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还不是十分清楚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及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一再遭到挫败,就表明了这一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的革命者才在俄国革命的影响和帮助下找到继续前进的道路。于是,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决心发动一次联合国内外革命力量、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国民革命,推翻外国殖民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统治,以解决中国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

1925—1949年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的另一个阶段。对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观点和主张,将在另一部著作《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再续》(《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中进行分析和研究。

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致力解决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先后进行了四次激烈的武装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解决了中国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

在这一阶段,对中国发展的途径问题的探讨也并未停止。人们对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探讨,对土地问题和农村建设问题的探讨,对货币制度改革、银行体制建设问题的探究,对财政和赋税制度改革的研究等,不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前进。

但是,在发展的政治前提未能解决以前,国内的革命战争及对外民族解放战争,长期持续和极其惨烈,对经济发展途径的探讨,是难有多少成效可言的,至多只能是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问题留下若干思想资料而已。

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的前一阶段,人们对中国发展的要求,都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为榜样,企图通过发展使中国成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中国人士热衷于